

英国“新大学”的演变及其特征分析

胡钦晓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 19 世纪以降, “新大学”在英国高等教育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历史发展为脉络, 英国大学可以划分为“传统大学”“红砖大学”“平板玻璃大学”和“1992 后大学”四个时段。可以看出, 每一类“新大学”都是不同时代的特定产物, 适应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同需求, 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办学风格。当“旧大学”不适应社会发展, 但其传统地位又不便动摇之时, “新大学”组织便应运而生。这种明显的“年轮”和“波纹”推广特征, 恰恰印证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二元张力在英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色驱动。可以预言, 若干年后, 英国历史上早已存在的“新新大学”还会再次重演。

关键词: 英国; 新大学; 演变; 特征

作者简介: 胡钦晓(1973—), 男, 山东巨野人, 博士,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比较、高等教育原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9.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68(2014)03-0086-10 收稿日期: 2014-06-12

纵观英国高等教育史, 不难发现“新大学”在 19 世纪以后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实, 相对于中世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达拉谟(Durham)大学和伦敦大学各学院而言, 英国的“新大学”一词最早是指 19 世纪的城市大学(civic universities), 后被称为“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ies);^{[1]3-5} 20 世纪 60 年代《罗宾斯报告》发表后, “新大学”主要是指“平板玻璃大学”(Plate glass universities); 而在当前, “新大学”特指 1992 年英国颁布《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后, 授予多科技术学院(Polytechnics)高等教育学院(Colleges of higher education)等以大学身份的组织,

因此又称“1992 后大学”(Post-1992 universities)或“现代大学”(Modern universities)。本文将沿着英国“新大学”一词演变的历史脉络, 对各个时期“新大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组织特征等进行阐述,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英国高等教育组织变革的基本特征。

一、19 世纪中叶之前的英国传统大学

在 19 世纪中叶城市大学产生之前, 包括英国本土在内的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新大学”的概念。自中世纪至 19 世纪 30 年代, 英国仅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虽然迫于外界压力, 这两所大学

本文“英国”特指“英格兰”,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等不包括在内。

本文“新大学”并非特指英国历史上某一类新大学, 而是指“新大学”概念在英国本土正式提出后, 伴随新的大学组织类型产生而不断演变的概念体系。

曾先后进行了一些微弱的世俗化改革,如拓宽课程范围,严格考试制度,但其保守性、贵族性和宗教排他性依然非常明显。大学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学院的大门只向国教徒开放。1830年,大学每年学习费用就高达200~250英镑之多,只有贵族、绅士和富商的子弟才能够享受如此昂贵的教育;两校的课程依然以古典教育为主,缺乏实用价值。^{[2]233}在牛津、剑桥之外增设大学,已经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诉求。

事实上,早在1654年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执政期间,就曾动议在伦敦设立大学,并在英国北部曼彻斯特或达拉谟设立大学学院。但在牛津(Oxford)及保守势力的反对下,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19世纪30年代,牛津、剑桥的独霸局面开始发生动摇。1828年,不分教派招生、排除神学课程的伦敦大学宣布成立。1829年,国教派为抵制伦敦大学,在其附近成立了英王学院(King's College)。无论是伦敦大学,还是英王学院,在成立之初并没有获得学位授予权。正当两校讨论是否合并以争取学位授予权之时,1834年由英国国教徒创办的达拉谟大学成功获得学位授予权。罗伯特·安德森(Anderson)认为,“达拉谟大学之所以一开始就获得认可,主要因为它是英国国教的”^{[3]28}。1836年,非宗教色彩的原伦敦大学不得不易名为伦敦大学学院,与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英王学院实行非实质性合并:两者独立办学,其学位授予权则归属于新成立的伦敦大学。因此,严格说来,获得学位授权后的伦敦大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束缚,它是国教徒、非国教徒、伦敦市政、英国皇家、牛津剑桥等多方势力相互争执、最终妥协的混合产物。

所以,从完整意义上来说,尤其是从宗教属性和教育平等的层面来看,无论是达拉谟大学还是伦敦大学,都不能称为“新大学”,充其量可将伦敦大学视为从传统大学到现代大学过渡的转型组织。当然,伦敦大学学院所开创的摒弃神学课程、传授现代学术和科学、不分教派招生等,其意义是不容抹杀的,这也为后期城市学院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概括说来,在这段时期,英国大学教育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贵族化色彩浓厚。据统计,1835年牛津大学仅有一位平民子弟,到了1860年没有一名平民子弟,所有学生均来自绅士、牧师等贵族家庭。在剑桥、伦敦和达拉谟大学,穷人

子弟亦不多见,其学费只能是来自上层阶级的家庭才能够承担。同样,这时的大学教师也主要来自贵族阶层。以1813—1830年的牛津大学为例,有45%的教师来自牧师家庭,28%的来自乡绅、骑士和绅士家庭,15%的来自商业和专业人士家庭,只有5%的来自非贵族阶层。^{[4]208}师生贵族化的组成,直接造成了大学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的精英化和贵族化。(2)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工业发展需要。19世纪70年代以前,牛津之外的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异常微弱。由于缺少私人捐赠或公共资金,伦敦大学各学院深陷困境,因而常被认为是进入“牛津”的补给站(staging post)。从1836年伦敦大学建立到1858年,所有学位类型仅仅授予了1469人。换句话说,整个伦敦大学所有附属学院的学生数量,每年平均只有70人。^{[3]72}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在伦敦成功举办,标志着英国在工业国家的领先地位,但这几乎与大学无关。“维多利亚工程师的培养,不是基于大学而是基于先辈流传下来的、家庭作坊式的学徒制。”^{[5]206}(3)大学区域发展存在严重失衡。伦敦大学获得学位授予权后,以“伦敦—牛津”为轴心的东南地区,压倒性地超过了北部和中部地区。位于东北部的达拉谟大学由于招生人数较少(每年50人左右),且仅有文科和神学专业,因此势单力微,影响有限。与此同时,伴随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一批大中型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利兹等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崛起。经济迅速发展,与大学机构的缺失,愈加显示出英国大学分布的区域失衡。(4)女性被排除在大学教育之外。这段时期,在英国没有任何大学为任何阶层的女性开放学位。伦敦大学在1878年,达拉谟大学在1890年才分别向女性开放学位,而牛津、剑桥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逐渐允许女性获得学位。

二、作为“新大学”的“红砖大学”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慈善捐赠盛行、政府管理缺位、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市民对大城市怀有强烈自豪感和责任感的多重作用下,部分富有商人、企业家先后捐资兴建了一些城市学院,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1851年)、南安普敦(Southampton,1862年)、利兹(Leeds,1874年)、伯明翰(Birmingham,1880年)、利物浦(Liverpool,1881年)等,但这些学院起初均无学位授予权。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当地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且还损伤了新兴城市市民的荣誉感,在他们看来,“大城市应该拥有一所大学,就像每个城市应当拥有一所教堂那样”^{[4]139}。新建城市学院升格为大学,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1860年以后,大英帝国国土迅速扩张,国际贸易竞争激烈,制造业应用科学和大型工业公司急剧发展,亟需高等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尽管城市学院在创办之初,就根据各地工业和科学发展实际情况,设置了相应的技术研究中心,但由于其学位授予权归属于伦敦大学,且授予范围狭窄(仅限于传统的文学、法律和医学),严重制约了人才培养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而此时的英国传统大学依旧保守地进行古典人文教育,伦敦大学的有限变革也很难为新形势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政府阶层深知,要想重建并维持英国的经济地位,必须尽快效仿德国,建立一批能够培养多样性技术人才且能独立授予学位的大学。城市学院的兴起及需求,恰恰迎合了国家意愿。

在多方合力促使下,英国很快授予了六所城市学院皇家委任状,承认其大学地位。这六所大学为:曼彻斯特大学(1880年)、伯明翰大学(1900年)、利物浦大学(1903年)、利兹大学(1904年)、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1905年)和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1909年)。从获得委任状开始,新建大学便拓展了学位培养和授予的领域,并扩大了招生数量。例如,利物浦大学在外科学、建筑学、兽医医学、工程学等方面建立起了自己的学位授予种类,学生人数在十年内以两倍的数量激增,伯明翰大学在酿造、有色金属冶炼,利兹大学在纺织、工商管理,谢菲尔德大学在采矿、钢铁冶炼等方面均开设了新型学位授予类型并获得长足发展。^{[4]151}

这些“新大学”具有以下特点。(1)校园建筑主要是由色调鲜明的红砖,并配以红色涂料装饰而成;而牛津和剑桥大学则是由色调灰白的石料,并配以教堂式塔尖构成的:两类大学建筑风格迥异。1943年利物浦大学教授佩尔斯(Edgar A. Peers)在描述城市大学发展时,根据其建筑特点,明确提出“红砖大学”之说。“红砖大学”随之成为“新大学”的代名词。(2)所有红砖大学均是由私人捐资兴办,国家只是提供委任状,确认其大学地位,它们的创办与政府以及牛津、剑桥并无关联,更不存在中世纪大学式的“母子关系”。^{[6]23-24}(3)所有红砖大学都是从城市学院发

展而来,自开办之初就不受宗教限制且对女性开放。校长是大学的主要管理者,市民代表(lay representative)和教师代表共同参与大学管理。这种“寡头政治和代表性民主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与传统大学“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的管理方式存在显著不同。^{[7]25}(4)由于创办经费不足,红砖大学并没有实行传统大学的寄宿制,而是实行走读制。其学生也主要来自当地。后来,尽管部分红砖大学为学生提供了住宿,但这种住宿更加类似于美国大学式的宿舍管理,与牛津剑桥的寄宿制有着本质不同。^{[7]30}(5)红砖大学的内部组织,没有承袭传统大学的寄宿学院制(Collegiate System)模式,而是按照学科学院(faculties)的模式进行划分。“新大学”的教学方式没有采用传统大学的导师制(Tutorial System),而是实行注重规模效益的大班授课制。^{[7]30}从教学内容上来说,这类“新大学”并不注重对学生进行自由教育式的心智训练,而是更加关注与当地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从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只建立了一所雷丁大学(Reading, 1926年)。战后,国家对科技毕业生的需求明显增加。由此形成英国第二次红砖大学的建设波峰,先后又有六所城市学院获得大学地位,分别为:诺丁汉大学(Nottingham, 1948年)、南安普敦大学(1952年)、赫尔大学(Hull, 1954年)、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1955年)、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1957年)和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1963年)。

相对“前新大学”,第二批红砖大学建立后的英国高等教育呈现以下特点。(1)大学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强。红砖大学建校伊始,就注重不分教派、不论性别招收当地学生,尤其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学生。据统计,1950—1951年,英国大学全日制入学总人数为85 314人,其中男性为65 831人,女性为19 483人,女性已经占据大学入学总人数的23%。在利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每年招

佩尔斯教授在撰写其专著《红砖大学》(Redbrick University)一书时,使用的是Bruce Truscot笔名。参见Harold Silver, The Universities' Speaking Conscience: 'Bruce Truscot' and Redbrick University, History of Education, 1990, 28(2): 173.

根据1963年8月的国会法案,纽卡斯尔大学获得独立大学身份。因此,有学者将其归入20世纪60年代“新大学”,亦即“平板玻璃大学”之中。但是,作为典型的城市大学,无论从组织管理形式,还是从教学内容方式而言,都应被划分到“红砖大学”之列。

生人数均在3 000人左右,女性入学比例高达入学总人数的1/3。^{[7]30-52}这段时期,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占据红砖大学的主体,1908年利物浦大学有超过3/4的学生来自于当地中产阶级家庭,到了20世纪50年代其比例仍然不低于60%。中产阶级子女入学的增多,直接导致大学教师中来自社会中层学术职位增多。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学中来自非贵族化家庭的教师,已经超过教师总数的2/3。^{[5]22}(2)大学学术上的双向漂移。城市学院成立之初,主要集中发展适合当地社会经济需求的学科专业。为获得大学地位,它们确有向传统的牛津和剑桥逐渐靠拢的迹象,譬如增设文科专业、扩大生源范围、注重科学研究等。但如果说红砖大学已经为牛剑所“殖民”(colonized),却有夸张之嫌。有大量证据表明,红砖大学拥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学科的设置与牛剑也有很大差异。纽卡斯尔大学的采矿,伯明翰大学的酿造,谢菲尔德大学的冶金和玻璃技术,利兹大学的纺织等,都已经形成了与各自城市发展密切相连的专业区域特色。^{[3]44-45}“新大学”不但所开专业与现实密切相关,迎合了国家需求,而且注重在英国本土尤其是本地区招收学生,迎合了当地需要。红砖大学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牛津和剑桥。牛津和剑桥开始不受教派限制、招收女性学生、关注经济发展、开设应用型学位等,都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红砖大学的影响。因此,乔治·内勒(George F. Kneller)认为,“红砖大学事实上引领了牛津和剑桥更新的教育理念和实践”^{[7]204}。所以,在传统大学和新大学之间的学术漂移并非单向,而是双向影响、相辅相成的。(3)大学区域发展得到改善。“前新大学”时期,以“伦敦—牛剑”为轴心的东南地区独霸英国,达拉谟大学孤掌难鸣。第二批红砖大学产生后,英国大学区域布局得以改善。在第二批7所红砖大学中,除了雷丁大学和南安普敦大学稍靠近东南地区外,其余5所都居于东南地区之外。尤其是成立较早、发展迅速的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利兹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等紧密相连的中北部城市大学群,已经构成了与“伦敦—牛剑”分庭抗礼、南北制衡的掎角之势。(4)开创了不经皇家委任状,而经国会立法授予大学地位的历史先河。在新成立的13所红砖大学中,纽卡斯尔大学并不是通过获得皇家委任状,而是通过国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获得独立大学身份的。

这不仅暗示着政府立法在大学管理作用的日益加强,而且也以为以后英国“新大学”的成立,尤其是为“1992后大学”的成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作为“新大学”的“平板玻璃大学”

红砖大学创办之后,各种批评声音几乎没有中断。批评者认为,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绝不仅是为学生将来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还应当指导他们更好地学会生活,尤其是怎样幸福地生活。每个步入社会的人,都要直面自己的生活环境,并对个人日常重要问题作出判断和选择。^{[7]101-108}

利兹大学教授多布利(Bonamy Dobrée)认为,无论何种类型的教育,都应当启迪学生自由、好奇的心智,能够使他们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红砖大学里大部分毕业生,都没有能够获得知识间内在关联的意识;偏向科技应用型人才培养,缺少对人的心智训练,无疑会造成学生身心的日渐分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杰弗里(George B. Jeffery)也强调,当下大学越来越多地关注“功能”(instruction),越来越少地关注“教育”(education),其结果必然导致日趋严重的学科碎片化。他呼吁,应当把知识的整体传授作为首要任务;大学应当把众多的学科专家,按照知识的整合性集结起来,为他们进行学术交流提供方便,创造一个更为宽广、更为亲密的学术共同体(community),而不是众多的、相互割裂的离散系科(departments)。^{[7]206-208}此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红砖大学”一词的首倡者、利物浦大学教授佩尔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前副校长莫伯利(Walter H. Moberly)等都曾对红砖大学提出批判。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C. P. Snow)在剑桥大学所作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则将人文与科学相互割裂的最终原因归结为当时的教育体制,进而将红砖大学的批判推向高峰。^{[7]25}

为应对高等教育变革需求,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立了以罗宾斯勋爵(Lord Robbins)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在考察本土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于1963年形成了著名的《罗宾斯报告》。该报告不仅建议要创办适合多学科发展的新型大学,而且还建议将高级技术学院(CATs)升格为大学,同时增设人文社会科学专业。

事实上,早在1958年英国政府就同意在南部布莱顿市(Brighton)建立新型的苏塞克斯大学

(Sussex)。1959年该大学成立,1961年获得皇家委任状,成为英国20世纪60年代第一所“新新大学”(New-new University)。^{[8]64}建校之初,苏塞克斯大学就成立了多学科整合、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学院”(Schools of Study)。无独有偶,英国工党先驱林赛(A. D. Lindsay)从政府中获得公共基金,购置了纽卡斯尔莱姆河畔的一处私人住宅——基尔城堡(Keele Hall)作为新建大学校园。1962年,基尔大学获得皇家委任状,成为英国第二所“新新大学”。基尔大学创办之初,除实行多学科教学研究外,还一改红砖大学的走读制,实行全寄宿制,其首批聘任的教授也被要求住在学校宿舍内,以加强对学生的个人辅导。

伴随《罗宾斯报告》公布,英国新大学创建日趋高涨,先后创办了东安格利亚大学(East Anglia, 1963年)、约克大学(York, 1963年)、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1964年)、肯特大学(Kent, 1965年)、艾塞克斯大学(Essex, 1965年)和沃里克大学(Warwick, 1965年)。以1966年为分界线,英国政府在已有高级技术学院的基础上,先后升格了8所大学:罗浮堡大学(Loughborough, 1966年)、阿斯顿大学(Aston, 1966年)、布鲁内尔大学(Brunel, 1966年)、萨里大学(Surrey, 1966年)、巴斯大学(Bath, 1966年)、布拉德福德大学(Bradford, 1966年)、伦敦城市大学(City, 1966年)和萨尔福大学(Salford, 1967年)。此后直到1992年,英国除建立了一所远程大学(Open University)和一所私立大学(University of Buckingham)外,再未建立新的大学。

整体而言,这段时期创建的“新大学”具有以下特点。(1)从物理层面来说,新大学创建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不低于200英亩的校园,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都坐落在拥有广阔“绿地”之上的城市边缘,而不像红砖大学那样坐落于城市中心。这些学校的建筑属于现代化设计,在钢材或混凝土结构中广泛使用了平板玻璃,建成速度快且更加宽敞明亮,与传统大学和红砖大学的建筑风格迥异,因而被称为“平板玻璃大学”。至20世纪末期,“新大学”特指这些“平板玻璃大学”,而“新新大学”也随之淡出学者或民众的话语。(2)从经费来源上看,“平板玻璃大学”打破了以往民间或个人办学的传统,国家在大学的设置和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早在“二战”之前,大学就被视为当然的国家机构,但从

政府获得的经费仅占1/3左右(1938年为36%)。1949年国家开始为大学教师提供薪水,同时拨款力度不断增加。“‘平板玻璃大学’有90%的资金来源于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UGC),他们自创建之初就志在成为一个国家甚至国际性的机构,而非地域性的城市大学。”^[9]1962年,英国学生资助体系开始形成,国家奖学金、当地政府奖学金、大学和学院奖学金等,为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提供了多样的保障,也促成了新大学学生明显的非地域性特征。如在1970年,东安格利亚大学只有不到4%的学生来自当地。^{[3]74}(3)注重住宿制与习明纳(Seminar)教学。有感于红砖大学走读制和大班授课制造成的师生疏于交往,约克大学首任校长詹姆斯(Eric James)认为,如果过于懒散而不能提供个别指导,如果过于吝啬而不能提供寄宿,那么大学将面临不能称为“真大学”(true universities)的危险。因此,他的理想是效仿牛津、剑桥大学的学院寄宿模式。^[9]然而由于“新大学”的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传统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不可能提供公共资金去建造一个超过已获得大学地位水准的寄宿制大学。最后,“新大学”的运行采取了折中方案,既非传统大学寄宿制,也非红砖大学走读制,而是提供多样性的住宿安排。与之相应,在教学方法上,既非传统大学一对一的导师制,也非红砖大学的大班授课制,而是以习明纳为主的多种方法结合。(4)强调跨学科教学与研究。为了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这类新大学致力于自由教育而非职业教育,其发展路径又各具特色。区别于技术学院,这类新大学强调将教学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大研究生规模。如艾塞克斯大学建校伊始,就计划将本科生与研究生在校比例提高到3:1或4:1,而非当时的7:1。^{[6]51}所有新大学都旨在拓宽本科阶段的课程,将高水平的专业化发展放在研究生阶段。

以上特点为新大学注入了强大活力。20世纪末,它们已发展成为英国最为成功的研究型机构,一些大学已经构成对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金三角”地区的强有力挑战,同时也撼动了大型红砖大学的自足感。1996年,“平板玻璃大学”中有沃里克、兰卡斯特、约克、艾塞克斯和苏塞克斯大学等进入了英国研究型大学的前12位,其中约克大学被认为是仅次于剑桥教学质量的组织机构。^{[6]52}政府财政的鼎力支持,新建大学的高点定位,为“平板玻璃大学”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强大

动力。

相对于红砖大学时期,“平板玻璃大学”时代的英国高等教育呈现以下特点。(1)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缓慢步入大众阶段。长期以来,英国高等教育属于典型的精英模式,直到1990年才终于完成了从精英到大众的艰难蜕变。(2)高等教育二元制结构形成。英国高等教育历史上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传统:自治和服务。前者与社会相对分离,是一种孤独的、学术的、保守的、排外的精英教育,强调科学研究、追求真知、培养完人;后者则主张高等教育要服务于个人和社会,是一种回应社会的、职业性的、不断创新和开放的大众教育机构,其目的不是追求纯粹知识,而是解决现实问题。这两种风格自19世纪初城市学院创办起,就不断处于博弈之中,也成为保守党和工党政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为维护自治传统,保留精英教育,保守党政府支持大学远离技术学院和底层民众;为回应城市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现实需求,工党政府也倡导建立与大学避免冲突、并行不悖、相安无事的公共教育部门。1966年,政府颁布《关于多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的计划》白皮书,将8所高级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并将原有90多所独立学院合并为30所与大学平起平坐的多技术学院,成为高等教育中的“公共部门”。^[10]至此,英国高等教育二元制结构正式形成并延续到1992年。(3)隐性的单向学术漂移。《罗宾斯报告》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同等表现同等奖励,大学可根据功能不同,划分出多样类型,但这种划分不应是基于传统和声望,而应当基于现实贡献,鼓励优秀者脱颖而出。人为区分的二元政策一出台,就遭到包括大学校长委员会和罗宾斯本人在内的多方批评。在现实发展中,处于下层的多技术学院并不甘于沦为二流的人为界定,也未严格遵守单一的职业性、地域性和教学性的发展定位,而是缓慢地、单向地向大学模式逐步漂移。由于人文社会科学花费相对低廉,多技术学院纷纷建立了这些学科,职业性身份不断退减;由于生存需求,多技术学院不断扩充地区外学生的招生数量,地域性身份开始突破;由于国家学位授予委员会(CNAA)控制,多技术学院努力保持与大学相同的质量,学术性标准逐步提升。当这些隐性的单向学术漂移达到一定程度 and 规模,高等教育二元制的界限开始趋于模糊,最终走向一元制,发生“静悄悄的革命”^[11]也

将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四、作为“新大学”的“1992后大学”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始扩大高教规模,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与之相伴的是,经济危机下的“撒切尔主义”迫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却不断锐减。

20世纪60年代创办的“平板玻璃大学”一开始就走上了国家化甚至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传统的牛津和剑桥一直保持着精英主义的教育模式,早期城市大学在发展中也逐渐偏离为当地服务的原初目标,二元制高等教育中的这三类大学在高等教育扩招的空间有限。统计数据表明,从1984到1993年间,旧大学的注册入学学生只增长了54%,即从30.5万增加到47万多。而多技术学院的入学增长却异常迅猛,到了1991年,除非全日制(part-time)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大学外,全日制(full-time)学生人数也已经超过大学,占到一半多。^[12]长期的隐性学术漂移,一些多技术学院已经达到了较高学术标准,加之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中的贡献,使之不甘于承受地方政府控制,对人为的二元体制划分更是怨声载道。

伴随英国高等教育由精英缓慢步入大众以及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学生骚乱,坚守精英贵族主义的执政党——保守党,越来越认识到低收入家庭、残障群体、少数族裔等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强调职业性、实用性的同时,培养大量的、人文与科技并重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英国应对国际挑战难以回避的历史性课题。1988年,政府颁布《教育改革法》,不但取消了“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大学基金委员会”(UFC),而且也取消了负责高等教育公共部门拨款的“国家咨询委员会”(NAB),成立“多技术学校和学院基金委员会”(PCFC)。1992年《继续和高等教育法》颁布,撤销刚刚成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多技术学校和学院基金委员会”,成立统一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E),允许多技术学院更名为大学,可以自主授予学位。随后,英格兰32所多技术学院更名为大学。2001年后又有格洛斯特大学(Gloucestershire, 2001年)、伦敦市立大学(Metropolitan, 2002年)、波尔顿大学(Bolton, 2004年)等21所英格兰新大学获得认可,这些新大学均被称之为“1992后大学”或“现代大学”。

整体而言,“1992后大学”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从物理层面来看,一般拥有多个校区,且散布在城市各地甚至是多个城市。由于长期的融合与凝聚,经多所院校合并后的校园建筑,也与其他时期大学明显不同。“红砖大学”在创建之初,就得到富有财团的巨额投入,拥有大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罗宾斯时代的“平板玻璃大学”,一开始就建在广袤的绿地之上,不但拓展空间巨大,而且建筑也紧跟时代潮流;这类“新大学”则继承了不同时期、各种类型的建筑特色,只有少数大学拥有一个整体校园,这些大学更像由多个校区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很难有新的拓展空间,有时不得不等到某些工厂破产后,在“褐色土地”(brown field)上寻求发展。^{[6]98}德蒙福特大学(De Montfort, 1992年)、德比大学(Derby, 1992年)等都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2)从管理层面来看,这类“新大学”起源于当地,政府官僚化色彩浓厚。大学成立之前,长期由地方政府管理;成立之后,其治理章程是在《教育改革法》和《继续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下编写的。“旧大学”治理章程因形成较早,不受这些法律约束。政府不仅无权对其章程进行修改,而且也无权强行改革已有的治理结构。在实际管理运作中,“旧大学”往往自恃优越,对政府介入持抵制态度;“新大学”因受制于政府,对其介入则往往表示认同和支持。前者过于傲慢、后者过于顺从的状态,直接导致在大学内部治理中,“旧大学”倾向于民主,“新大学”则趋于集中。(3)从功能层面来看,“新大学”更加强调教学和服务,对于研究的关注远不如“旧大学”强烈。罗尔夫(Heather Rolfe)调查研究认为,“旧大学”强调科学研究和追求学术卓越的意识要远远高于“1992后大学”,部分“新大学”至今尚未形成“研究文化”(research culture)。为吸引广大的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非全日制学生,“新大学”一方面不得不积极扩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性职业课程,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扩大“次级学位”(sub-degree)的提供,如预科学位(foundation degrees)和国家高级专科文凭(HNDs)等。^[13]相对于“旧大学”而言,“新大学”有着较高的师生比和较低的研究资助,动辄上万人的学生规模意味着其教学方法已不再单一,而是更加灵活多样。为提高教学效率,适应远程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需求,“新大学”更加注重成人教育方法和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运用。

相对于平板玻璃大学时期,1992年以后的英国高等教育呈现以下特点。(1)高等教育由大众阶段快速跨入普及阶段。1991年5月,政府公布白皮书《高等教育:一个新的框架》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快速增长的宣言书。2003年1月,政府又颁布白皮书《高等教育未来》,指出2002年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3%,并提出到2010年毛入学率要达到50%。事实上,到了2004年,整个英国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已达224.74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提前完成预定目标,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14]尽管这段时期的跨越式发展,受到学龄人口减少、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知识经济推动等方面的影响,但“1992后新大学”群落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重要方面。(2)一元体制下的多元发展。伴随《继续和高等教育法》通过以及“1992后大学”的相继成立,长期形成的、人为的二元制高等教育划分走向终结,所有拥有大学身份的组织机构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认可。之前形成的大学校长委员会(CVCP)也相应更名为“英国大学联合体”(Universities UK),将“1992后大学”融入其中。但是传统所造成的声望差别并不能为法律所消除,不同大学本质目标的等级边界依然明显。尽管所有大学都对研究与教学相统一作出了承诺,但是对何谓研究、怎样教学、如何均衡等诸多问题的不同解读,使各类大学很难走向统一。有些新大学仍然坚守着旧的工艺学校本质,也有不少新大学则怀有更大抱负,渴盼跻身精英大学的行列;传统大学的精英意识依然强劲,1994年由19所研究型大学自发成立的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中,只有一所是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大学(沃里克大学),其他成员皆为更早时期成立的大学。^{[3]97-98}高等教育一元体制下的多元发展,已经成为英国1992年后的一个不争事实。(3)政府管理与市场引导的双重介入。严格说来,20世纪以前,英国政府对大学发展的介入是极其微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关系,1919年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英国开始运用政府拨款来影响大学发展。而此时的大学生拨款委员会也只是扮演着协调者角色,是维护大学自治、协调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缓冲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英国政府增加了大学拨款,从而使政府拨款在大学运营中占有了较大份额。在“谁付账,谁点唱”^{[15]79}的市场逻辑下,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力度日益增强。1988年,大学拨款委员

会被强行取缔则见证了政府对大学的深度介入，取而代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已不再是完全由学者组成，而是增加了工商和财政等方面的人员，在管理上不仅具有较强的行政特点，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市场色彩。与国家介入不断增强相悖的是，政府拨款自撒切尔以后却不断缩减，与工业联姻、从雇主中获取运营经费就成为英国大学不得不为的发展路径。“1992后大学”则成为以市场为引导的首批先驱。1996年，在商人迪尔英的带领下，组成调查委员会，论证英国未来二十年高等教育应当如何发展。与罗宾斯委员会不同，迪尔英委员会全部是由商业和大学领导而不是由学者或教师组成；与《罗宾斯报告》不同，《迪尔英报告》几乎不顺从大学自治问题。^{[3]92-93}在迪尔英被告知政府没有多余经费支持高等教育的情况下，《迪尔英报告》运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建立筹措

高等教育经费的新机制，譬如吸引工业部门资金、收取学生学费、竞标地方基金项目，以及通过立法评估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等等。不难看出，市场运作逻辑已在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英国各类“新大学”的特征比较

纵观英国“新大学”的历史演变，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新大学”在建筑风格、创办者及管理方式、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受教育者的主流群体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表1试图对这些重要指标上的表现进行归纳，并与传统大学进行比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历史沧海桑田地变换，四类大学组织在发展中会或多或少地相互漂移借鉴，因此我们将侧重对大学初创时期的基本特征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时期英国“新大学”的基本特征比较

	传统大学	红砖大学	平板玻璃大学	1992后大学
产生时间	12、13世纪	19世纪末至二战	1961—1968年	1992年以后
典型代表 (数量)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3)	利物浦大学 利兹大学(13)	苏克塞斯大学 约克大学(16)	伯明翰城市大学 格林威治大学(53)
建筑风格	灰白石料 教堂式塔尖	红砖 红色涂料	钢材、混凝土 平板玻璃、广阔绿地	多个校区 不同时期各类建筑
创办者及 管理方式	学者社团 大学自治	民间捐资 校外人士参与管理	政府创建 国家管理	地方政府创办 国家管理、市场引导
教育目的	培养绅士， 服务上层建筑	培养技术工人， 服务城市发展	培养跨学科人才， 为国家发展服务	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为区域发展服务
教育内容	理智教育 博雅教育	单科性技术教育 职业和应用学科	文化与科学相融 跨学科教学研究	以学生需求为中心 教学性职业课程
教育方式	学院制 寄宿制 导师制	系科制 走读制 大班教学	学科学院制 住宿制 习明纳、小班上课	灵活的系科或学院 住宿制 强调信息技术运用
主要受教育群体	精英阶层	当地中产阶级	地区外中产阶级	低收入家庭、残障群体、少数族裔等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将英国“新大学”的历史演变的基本特征归纳如下：

1. 从产生时间与大学数量上来看，红砖大学之前的6个多世纪中，英国大学处于相对保守和有限变革时期，仅有牛津、剑桥和达拉谟等3所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和伦敦大学这一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组织机构。而后，英国先后在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产生了13所红砖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16所平板玻璃大学，这段时期属于英国大学平稳发展时期。1992年以后，英国大学则进

入了高歌猛进的快速发展时期，至2001年新建大学数目就达53所，比英国之前历史上所有大学数目的总和还要多。

2. 四类大学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物理特征。因受基督教教会影响，传统大学建筑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灰白石料并配以教堂式塔尖的风格，让人不难联想到英国大学的久远历史，学者自治仍然是其至今坚守的不二法门。“红砖大学”与“平板玻璃大学”则因其物理建筑风格而得名，两类大学建筑都与当时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

切相关。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由当地民间财团出资筹建,由校外人士介入管理;后者则是直接由政府拨款创建,由国家垂直管理。创办者从学者社团到民间组织再到国家政府,清晰地展现出英国大学设置由自下而上逐步到自上而下的历史变迁。如果把前三类大学比喻为参天大树,那么“1992后大学”则是由低矮小树和灌木丛林组成的混合群体,由国家按照地域进行划分并赋予大学地位。不同院校组成、多个校区设置、各类建筑风格是“1992后大学”的鲜明特征,其中有的新大学志在追寻旧大学的发展路径,由低矮小树逐渐成长为参天大树;有的新大学则志在扎根本土服务当地,成为保持水土和防风固沙的灌木林。

3. 与鲜明的时代物理特征相应的,是各类大学都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传统大学旨在进行精英高等教育,培养绅士以服务于上层建筑,受教育群体主要是来自上层社会。“红砖大学”和“平板玻璃大学”承担了大众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受教育群体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所不同的是,前者着重于服务当地城市发展,培养熟练技术工人,受教育群体主要来自当地中产阶级;后者着重于服务国家建设,培养跨学科人才,受教育群体主要来自地区外中产阶级。“1992后大学”则承担了普及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旨在立足当地,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受教育群体主要由低收入家庭、残障群体和少数族裔等组成。与从传统到近代再到现代明显的“年轮”特征对应,各类大学也表现出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高等教育,即从上层到中层再到底层民众的、由里及外的“波纹”推广特征。

4. 与“年轮”、“波纹”特征相应的,是四类大学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各具特色。传统大学旨在进行以文科为导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理智教育和博雅教育,其教育方式则是昂贵的寄宿学院制和“一对一”的导师制。“红砖大学”一改传统大学的精英教育模式,着重发展以职业和应用学科为导向的单科性技术教育,设立狭窄的系科而非学院,实施走读而非寄宿,大班授课而非“一对一”指导是其鲜明特色。“平板玻璃大学”试图对传统大学的教育内容和方式进行回归,倡导文化与科学相融,进行跨学科教学研究,但是由于受到经济、政治、传统等条件影响,其教育方式最终采取折中的方法:既非寄宿学院制也非系科制,而是跨学科学院制;既非寄宿制也非走读制,而是更加灵活的住宿制;既非导师制也非大班授

课制,而是适合研究特点的习明纳和小班授课。“1992后大学”主动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强调以学生需求为中心,实施教学性职业课程,以满足广大底层民众接收高等教育的需求。在教育方式上,“1992后大学”吸取了以往大学的长处,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组织和校园住宿安排,同时适合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的现代信息技术运用,成为其教育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结论与启示

如果把“新大学”一词放置在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每一类“新大学”都是不同时代的特定产物,适应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同需求,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办学风格。当“旧大学”不适应社会发展,但其传统地位又不便动摇之时,“新大学”组织便应运而生。除“平板玻璃大学”中部分新大学是由国家直接创立外,其余时期的“新大学”都是在原有学院的基础上演变而成,都经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变革,在不危及传统大学地位的基础上,获得大学身份。这种明显的“年轮”和“波纹”推广特征,恰恰印证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二元张力在英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色驱动。尽管说“学术漂移”与“模式趋同”是任何一类“新大学”自产生之日就或多或少存在的发展现象,但各类大学的边界特色至今仍清晰可鉴。牛津和剑桥为适应社会发展也逐步进行自身变革,但其精英教育地位仍不可撼动。即使一个学生获得了“红砖大学”的学位,他们仍然希望研究生教育能在牛津和剑桥进行;即使政府市场等外部权力不断入侵,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早已深深植入机体,其原则仍为牛津剑桥所坚守。

正如任何一个时期的新大学产生都会遭遇旧大学的反抗和歧视一样,冠名为“现代大学”的“1992后大学”也不例外。相对于其他时期的“新大学”,“1992后大学”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将更加严峻。正如约翰·格莱德希尔(John Gledhill)所言,一胎多胎是困难的,一些孩子未必能够出世,其他或许在紧张中迎接新生,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下这一新大学群落最终得以降临。^{[6]95} 尽管这些大学又被冠以“现代”,但绝非现代化意义上的新大学;尽管它们常以“职业”特色自居,但是与传统大学的法学、神学、医学职业性毫无关联;尽管他们特别强调应用研究,却因研究“不纯粹”而

遭到传统大学的蔑视。一言以蔽之,“1992后大学”要想真正融入英国大学群落,仍然还需艰难而漫长的征程。

大学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时代进程,而绝非一个静止不动的历史终点,群体意义上的大学如此,单个意义上的大学亦然。英国高校目前正

处于新旧大学相融相离、相引相斥的微妙平衡点上,创新不断,传统不丢。尽管当下意义上的新大学“1992后大学”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是排在他们后面的一些非大学机构仍然存在。可以预言,若干年后,历史上早已存在的“新新大学”还会再一次重演。

参考文献

- [1] Herklots H G G. The Universities : An External Examination[M]. London : Ernest Benn Limited ,1928.
- [2] 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 [3] Robert Anderson. British Universities : Past and Present[M]. London : Hambledon Continuum ,2006.
- [4] Konrad H Jaraus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Learning 1860—1930[M]. Stuttgart : Klett-Cotta ,1982.
- [5] Halsey A H ,Trow M A. The British Academics[M].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6] David Warner ,David Palfreyman. The State of UK Higher Education : Managing Change and Diversity[M]. Buckingham : 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7] George F Kneller. Higher Learning in Britain[M].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8] 张建新.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研究:英国高等教育从二元制向一元制转变探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 [9] David Smith. Eric James and the ‘Utopianist’ Campus ; Biography ,Policy and the Building of a New University During the 1960s[J]. History of Education ,2008 ,37.
- [10] 张建新,陈学飞.从二元制到一院制——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的动因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
- [11] 胡建华.19世纪以来英国大学制度改革的基本特征及其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4,(2).
- [12] Patrick Ainley. Degrees of Difference :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1990s[M]. London : Lawrence & Wishart ,1994.
- [13] Heather Rolfe. University Strateg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 Th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on Old and New Universities[J].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2003 ,57(1).
- [14] 高书国.从徘徊到跨越:英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模式及成因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7,(2).
- [15]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罗雯瑶]